

日本妇女与侵华战争

孙立祥 韩立娟

(华中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9)

摘要 战时, 部分日本妇女既饱尝了饥饿、贫困和亡夫丧子之痛, 又通过“支前”等实实在在的工作盲从了统治阶级发动的侵略战争。这些日本妇女是带着“受害者”与“加害者”的双重身份走进侵略战争的, 此乃帝国主义侵略国家民众的一般实态, 只是在日本妇女这里表现得尤为突出而已。战时日本妇女对侵略战争的盲从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鼓励儿子或丈夫参军参战, 为侵略战争提供充足的兵员;(2)踊跃参加后方“支前”工作, 为侵略战争提供物质保障;(3)积极创作助战文学作品和国策电影, 为侵略战争制造舆论氛围。究其原因, 主要是由神国观念和天皇崇拜思想的心理驱动, 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教育的灌输毒化, 媒体的错误诱导和政府的高压统制等诸多因素综合作用所致。在日本右翼势力蠢蠢欲动的当前形势下, 如实指出这部分日本妇女盲从侵略战争之事实并剖析隐藏在这一行动背后的动力因素, 对避免历史悲剧重演, 重新认识日本民众与侵华战争的复杂关系, 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 日本妇女; 侵华战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 中日关系

从九一八事变入侵中国东北, 到卢沟桥事变开始全面侵华, 再到偷袭珍珠港挑起太平洋战争, 军国主义日本在侵略扩张的不归路上越走越远, 直至 1945 年战败投降。当法西斯幽灵徘徊于日本列岛、日军铁蹄长时段大规模蹂躏东亚邻国之际, 人们很少听到日本妇女源于善良天性和人类母爱的反战声音, 反而更多看到的是她们盲从侵略战争的遗憾身影。本文仅就国内学术界少有问津的部分日本妇女盲从侵略战争问题, 进行尝试性探讨。

一、部分日本妇女对侵略战争的盲从

频频发动侵略战争和一再进行外交讹诈, 是近代日本崛起的主要路径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尽管有“无产妇人同盟”等民间妇女团体表明过反战立场, 田畑染等民间妇女运动领导人也表达过和平心声^①, 但随着宫本百合子等进步妇女活动家先后被捕入狱和市川房枝等民间妇女运动领袖纷纷“转向”, 越来越多的日本妇女对战争政府采取了协调合作立场, 盲从乃至协助了统治阶级发动的侵略战争。概而言之, 具体表现在

以下三个方面:

1. 鼓励儿子或丈夫参军参战, 为侵略战争提供充足的兵员

将儿子或丈夫送上侵略战场并“祈战死”、盼其“勿生还”^②的日本妇女, 早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期间既已出现, 时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不仅队伍蔚为壮观, 所谓“感人事迹”亦俯拾即是。一位几个儿子都死于侵略战场的普通妇女, 竟对安慰自己的人说:“我不哭, 是因为我已经失去了孩子; 我落泪, 是因为我再也没有儿子可以送上战场了。”^③当年参加过南京大屠杀、晚年深刻反省侵略历史的侵华老兵东史郎, 在日记中这样记述了母亲送自己出征的情景: 1937 年“9 月 1 日, 母亲和弟弟重一来与我告别。我们在旅馆的楼上见面了。母亲很冷静, 重一也很冷静。接着, 母亲说: ‘这是一次千金难买的出征, 你高高兴兴地去吧! 如果不幸被支那兵抓住的话, 你就剖腹自杀! 因为我有三个儿子, 死你一个没有关系’。接着, 她送给我一把刻有文字的匕首。母亲的话让我多么高兴啊。我觉得母亲特别伟大, 没有比这时更知道母亲的伟大了。于是我在心中坚定地发

收稿日期 2013-11-02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处理中日关系的历史经验研究”(11BDJ002)

誓，我要欣然赴死！……我的生母就是这样笑着和我告别的，谈话冷静，并鼓励我毅然赴死。”^④这是在没有外人在场的情况下来自生身母亲的鼓励。类似来自至亲的激励，直接强化了日军官兵为天皇的“圣战”效死疆场的极端心理，也大大加深了对被侵略国家人民的战争加害。1942年5月卫生兵菊池武雄从战地寄给母亲的遗书，便足以表明这一点。他写道：“亲爱的母亲，我越发感到为国效命的时刻到了。我从入伍伊始，就决心将自己的身躯奉献给大君。身为男儿，没有比能够死于战场而感到愉快的了。我要高高兴兴地赴死。”^⑤至于妻子送丈夫上战场的所谓“感人事迹”，同样司空见惯。在此仅以轰动一时的井上千代子自杀事件为例，管窥一二。

九一八事变后的1931年12月中旬，大阪步兵第37联队的井上清一中尉，准备告别新婚妻子井上千代子出征“满洲”。时年21岁的千代子为了让丈夫全身心投入侵华战争，竟在其动身的前一天夜里偷偷刎颈自杀。她在遗书中写道：“我的夫君啊，为妻心中充满了无限的喜悦！若问我喜从何来，这便是能够在丈夫出征前高兴地离开这个世界，这样您就没有一丝牵挂了！……请为祖国效命于战场吧！”^⑥翌日清晨，井上清一将妻子的后事托付给家人料理，自己按计划登上了开往“满洲”的军舰。井上千代子只是一名普通妇女，然其“感人事迹”经统治阶级放大宣传而在日本国内外产生了巨大负面影响。

在国外，这起自杀事件激励了侵华日军的攻战杀伐，并直接衍生出惨绝人寰的“平顶山惨案”。千代子的自杀行为和遗书，等于鼓励丈夫在中国放手杀人直至战死。井上中尉在开赴前线的途中，曾这样对身边的官兵说：“为了不辜负妻子的担忧，我不再打算生还。我要尽一名军人的职责。”^⑦为了践行诺言，当所属第37联队在1932年3月回调日本本土时，他拒绝回国而继续留在中国东北作战，并一手导演了惨绝人寰的“平顶山惨案”。1932年9月即九一八事变一周年之际，东北抗日游击队袭击了日本人管控的抚顺煤矿，打死打伤数名包括矿长在内的日本人。为此，日本守备队对矿区附近的平顶山村三千多村民实施了报复性集体屠杀，是为轰动一时的“平顶山惨案”。据日本学者披露，直接指挥这次大屠杀的刽子手就是千代子的丈夫井上清一。加纳实纪代指出：井上清一本人虽然矢口否认，但当时住在抚顺的日本妇女都私下说，下令屠杀的就是出征前

妻子自杀的那个军官^⑧。泽地久枝在查阅当年抚顺日军守备队“职员表”后发现，当天值班的军官正是井上中尉。《抚顺煤矿终战记》也载明，指挥这次大屠杀的“N中尉”就是井上清一^⑨。可见，千代子之死不仅使丈夫变成了刽子手，更给中国民众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在国内，这起自杀事件成为日本法西斯化的催化剂，并直接导致军国主义妇女团体“大日本国防妇人会”的孳生。千代子的自杀行为，竟被媒体美化为“少妇美谈”，被电影公司拍成国策影片《死亡钱别》，被裕仁天皇赐尊为“昭和烈女”，被陆军当局吹捧为“昭和烈妇”，母校岸和田高等女子学校为其举行“慰灵祭”，出生地长龙村为她树起“殉国烈妇井上千代子夫人之碑”^⑩，等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喧嚣狂热之余更有好事妇女发起成立了“大阪国防妇人会”。千代子自杀事件给身为媒人并目睹过自杀现场的安田静女士以巨大的冲击。安田在参加完第49天法事后对身边的人说：“千代子的尊贵之死不能就此结束。满洲事变日益扩大，恐怕这是一场仅靠男人无法取胜的大战，妇女以及阿猫、阿狗、蝗虫都应该协助战争。”^⑪于是，她与住在同一街区的50多名家庭主妇倡议成立“大阪国防妇人会”。1932年3月18日，在大阪市第五小学举行了“大阪国防妇人会”成立大会。与会者发出“巩固的国防需要后方妇女和男人并肩合作”之口号，号召全市妇女“走出厨房和家庭，奋起保卫国家”^⑫。“大阪国防妇人会”一经成立，立即引起陆军大臣荒木贞夫等军政要人的重视，酝酿将这一地方性妇女团体扩大为全国性妇女组织。同年10月24日，在东京白木屋礼堂举行了有700多名妇女参加、多位陆海军高官出席的大型集会，正式将“大阪国防妇人会”更名为“大日本国防妇人会”。自此，有越来越多的日本妇女置身于这一军国主义妇女团体而成为侵略战争的“协力者”。

笔者欲强调指出的是，战争期间上述为人母和为人妻的所谓“军国之母”、“昭和烈女”等绝非个别，倒是像宫本百合子那样即使坐牢也始终坚持反战立场的反战妇女“是少数特例”^⑬。今天供奉在靖国神社里的战争“亡灵”有246万余尊，其中“靖国之母”和“昭和烈女”就占了7.5万余尊。难怪东条英机在1942年11月11日发给“大日本妇人会”成立大会的贺信中说：前线士兵发挥战斗力的内在动力来自母亲、妻子和姐妹^⑭。当年日本兵员充足和日军官兵在前线逞凶肆虐在

多大程度上来自后方母亲、妻子、姐妹的鼓励和支持,应该看得比较清楚了。

2. 踊跃参加后方“支前”工作,为侵略战争提供物质保障

战时日本妇女的“支前”工作,主要通过参加军国主义妇女团体有组织地进行。九一八事变后,与“无产妇人同盟”等民间反战妇女团体日渐式微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爱国妇人会”、“大日本国防妇人会”、“大日本联合妇人会”三大官方妇女组织迅速膨胀。仅参加“大日本国防妇人会”的日本妇女,1932年成立时只有数百人,1934年增至54万人,华北事变后的1935年底增至255万人,卢沟桥事变后的1937年底猛增至684万人,珍珠港事件后的1941年底更膨胀到925万人^⑤。时至1942年2月,随着上述三大妇女团体合并为“大日本妇人会”,已有2000多万日本妇女置身于这一庞大的妇女组织中。可见,参加军国主义妇女团体的人数随着侵略战争的不断升级而迅速攀升。这些妇女团体或向会员发出“军人舍命、我们拼命”^⑥之口号,或提出“生产决战”^⑦、“至诚协助”、“尽忠报国”^⑧之号召。如果说吉冈弥生、市川房枝等活跃于军国主义妇女团体的妇女干部们对侵略战争的支持作用显而易见,那么自觉或不自觉地走进这些组织并积极从事后方“支前”工作的普通妇女的助战作用同样不容忽视。其“支前”工作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通过投身“产业报国运动”,为侵略战争提供军需物资。为了响应政府“男人上前线,妇女去工作”等号召,本来很少走出家门的日本妇女纷纷走向社会,全面承担起本该由男人从事的各项工作。她们不仅担任公司职员、汽车司机、售票员、售货员、理发师、厨师等,很多人还进入军工厂和煤矿从事危险繁重的体力劳动。据统计,仅在军工企业工作的日本妇女,1944年为400万人,1945年增至600万人^⑨。尽管工作繁重而又艰辛,但很多妇女却感到无比荣幸。女青年远藤年子战时在航空补给厂工作,为每天能够亲自给“特攻”飞机供应油料而备感骄傲。她一度因战败而痛苦得“禁不住眼泪盈眶,什么事情都不能做了”;然痛定之后又不无自豪地宣称:“我的青春没有悔恨!”^⑩远藤年子是通过参加“产业报国运动”为战争效力的数百万日本妇女的一个缩影。实际上,无论妇女团体的干部还是置身其中的群众,她们都扮演了战争的协助者角色,只是作用大小有所不同罢了。

其次,通过参加各种实实在在的助战活动,为侵略战争提供物质保障和精神动力。她们除走进工厂投身“产业报国运动”外,还走上社会参加一系列支持“国策”运动。诸如,响应政府“国民精神总动员”号召,积极参加“后方家庭强化运动”、“家庭节约运动”、“女性储蓄运动”、“资金募集运动”、“资源回收运动”、“军机捐献运动”、“大陆花嫁运动”、“非常时期女性训练新高潮运动”等一系列妇女“报国”运动,以缓解战争物资和资金的不足,为战争政府“分忧解难”。具体包括:“停止美容烫发”,“剪掉和服长袖”^⑪;举行提灯游行,祝贺前线“大捷”;送迎官兵出征和“凯旋”,祈愿“武运长久”;缝制“千人针”腰带,为士兵“壮行”;向前线邮寄慰问信和慰问袋,鼓励官兵“英勇杀敌”;救治伤残军人,使之获得肉体上和精神上的慰藉;慰问和救助身边军属,解除前线官兵的后顾之忧;安葬战死者遗骨和为其扫墓,让“英灵”早日安息;捐献羊毛和捐造飞机,直接提供战争物资和杀人工具;充当“满洲花嫁”(即“满洲新娘”),直接效力于殖民地统治,等等。以邮寄慰问袋为例,九一八事变后很快就征集到了330万个慰问袋,卢沟桥事变后征集到的就更多。日本“中支派遣军”最高司令官山田乙三中将,曾就本土妇女向战地邮寄慰问袋的作用不无感激地说:“慰问袋从全国各地源源不断地寄到了我们的手上”,它把战场与后方紧密地连接了起来,我们“对此深表谢意”^⑫。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上述活动是在官方妇女团体干部们的直接组织下完成的,因此这些妇女干部发挥了将战争政府与妇女群众密切联系起来之纽带作用。当战争物资匮乏时,这些妇女干部就动员女性参加废品回收运动,1938年仅“大日本国防妇人会”就收到了会员捐献的毛毯百万条;当战争资金紧张时,这些妇女干部就组织女性参加募集资金运动,1937年仅“大日本联合妇人会”就募集到了22681.29元“支那事变派遣官兵慰问金”;当兵员锐减时,这些妇女干部就发起“嫁给伤残军人运动”,鼓励女性“为皇国结婚、为国家生子”,1941年10月31日仅从九州各港口发往前线的“求爱信”就多达13.7万封;当后方出现异动时,这些妇女干部就协助警察监视反战人士^⑬,等等。战时军国主义妇女团体的干部和会员们的上述既细致又具体的“支前”工作,不但在物质方面有力地协助了统治阶级发动的侵略战争,而且在精神层面鼓励了战地军人的逞凶肆虐。她们

在助长军国主义嚣张气焰和加深被侵略国家人民战争剧痛上的负面作用不宜回避，也无需回避。

3. 积极创作助战文学作品和国策电影，为侵略战争制造舆论氛围

在政府实施“思想战”、“舆论战”、“文坛总动员”的过程中，包括女作家、女诗人、女记者、女演员、女教师等在内的部分日本知识女性，通过笔和口加入了赞美战争的大合唱。尤其由作家、诗人、记者组成的“笔部队”，发挥了“枪部队”无法替代的特殊作用。

首先，亲赴前线考察并撰写“从军记”等战地报告，鼓舞国民和军队士气。吉屋信子是最早开赴中国战场进行战地慰问和考察的女性作家之一。1938年10月，她率先发表华北战场战地报告——《捷足先登：问题交集的满苏边境，战祸连绵的张鼓峰》，发挥了“鼓舞官兵旺盛斗志之效果”；而刊登该文的《妇女之友》杂志社社长，为此收到了多份来自前线将领的感谢电。同年底，吉屋被遴选为武汉会战“笔部队”成员随军考察，又在《妇女之友》12月号上发表了配有照片的《汉口攻略从军记》、《吉屋信子·小岛政二郎·菊池宽：三从军作家献给全体国民的热血手记》等作品。1942年，吉屋又随军前往东南亚考察，发表了《法印·泰国从军记：十二月八日的法印》等文章，成为红极一时的大众小说作家和“国策推进”最得力的人物之一。正是在吉屋信子的影响下，冈田祯子、堤千代等女性作家也纷纷加入了赞美侵略战争的大合唱^②。值得注意的是，“慰安妇”事项并未出现在这些女性作家的“从军记”中。难道这些女作家赴战地考察时，不曾耳闻或目睹过实施性暴力犯罪的慰安所？答案是否定的。日本女性史研究学者渡边澄子指出：“慰问战地的女性作家们，大概觉得慰安所的存在有助于提高男性斗志，所以才默认而不再说什么。如此无视同性的人权而关心男性的欲望，问题是严重的。”^③

其次，在后方炮制国策电影和战争文学，制造“举国一致”支持战争之氛围。电影方面，由原节子、高峰三枝子等演员出演的《二人世界》（1940年）、《户田家的兄妹》（1941年）、《绿色大地》（1942年）、《青春的气息》（1942年）、《夏威夷·马来海战》（1942年）、《冲向决战的天空》（1943年）、《愤怒的大海》（1943年）等国策电影，收到了“电影就是炮弹”^④之效果，“对把出征士兵引诱到战场上来发挥了重要作用”^⑤。小说

方面，女作家们或将侵略战争宣传为“圣战”，以煽动国民的战争狂热，或将日军暴行美化为“勇敢”，以激励日军的杀伐恶行，其作品完全违背了“真”、“善”、“美”文学创作原则，是赤裸裸为侵略战争服务的宣传品。例如，村冈花子在其《随笔集》（1942年）中这样写道：“母亲创造了国家，大东亚战争说到底是母亲之战；家庭才是我们工作的场所，立足于家庭翼赞是光荣的使命。”^⑥宇野千代创作的《妻子的信》（1942年）、横山美智子创作的《春之声》（1940年）等作品，都是作者倾注全部精力创作出来的支持战争的家庭小说。就连战死者妻子间濑一惠、战伤者妻子松井系子等“军国之妻”，也创作出了《天空遗言》（1940年）、《灯心草》（1943年）等鼓励其他男人继续效命于天皇“圣战”的战争小说^⑦。诗歌方面，创作出类似“吾子承蒙我大君之召唤是何等幸福”（神村照子）、“身为女人之躯的草莽臣民之热血同样气吞水火”（远山英子）等诗句的女诗人，也不在少数^⑧。在此，仅以著名女诗人与谢野晶子的“转向”为例管窥一二。

被日本诗坛誉为“千年一遇”的杰出女诗人与谢野晶子，曾在1904年日俄战争期间创作出著名的反战诗歌——《君勿去死》，初步表达了对战争的厌恶。后来，她不断发表诗歌和评论，将第一次世界大战谴责为“文明人一齐披上食人族假面具的蠢行”，将对华“二十一条”谴责为日本人“贪得无厌”本性的大暴露，将日本出兵西伯利亚谴责为干涉苏俄革命的丑行，等等。可见，每逢日本发动或参与侵略战争，女诗人都挺身而出表明自己的反战立场。尤其那首脍炙人口的反战诗《君勿去死》，影响至深至远。她以层层递进的方式，阐明了不希望弟弟被杀也不希望弟弟杀人的初衷：“父母把你含辛茹苦养育到二十四岁，绝不是为了叫你去杀人或是被杀”，指出战争的野蛮性和非人道性；经商世家当以“继承家业为重”，“旅顺口攻克与否与我们何干”，指出战争与人民毫无关系；“天皇如果体恤民心，当初又是怎么想的？”指出战争的根源是天皇和天皇制；为了让家中“白发日增”的年迈母亲能够安度晚年，为了让家中“纤弱娇小”的年轻妻子不再终日“以泪洗面”，绝不能去死，指出战争给众多母亲和妻子造成了心灵创伤。因为这首反战诗，与谢野晶子受到右翼围攻和军部监视而被禁止写作长达十年之久。然而，就是这位曾被日本诗坛誉为千古一人、被中国学者视为“献身和平事业的先

驱”^⑧——与谢野晶子，竟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不久便“转向”战争政府一边，这是十分耐人寻味的；而诗人的“晚节”不保，则显然被我国学者忽略了。据日本学者渡边澄子研究，随着九一八事变爆发，与谢野晶子开始自我否定以《君勿去死》、《乱发》等为代表的早期反战诗歌。1932年，为响应政府“振兴国民精神”之号召，她撰文歌颂在上海一二八事变中涌现出来的所谓“肉弹三勇士”的“非凡忠烈”之举，号召日本国民“必须具有三勇士一样的勇气”。该文对日本“从大正民主主义走向军国主义发挥了巨大的舆论作用”^⑨，以至被日本学者评价为“女性文学家参与战争的第一号人物。”^⑩考虑到战时就连无产阶级作家甚至日共党员亦纷纷“转向”的事实，与谢野晶子蜕变为当时“转向”潮流中的一员，应当不十分令人费解了。

不过，须指出的是，在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疯狂岁月里，并非所有日本女性都盲从和协助了统治阶级发动的侵略战争。战时尽管类似菅野须贺子、石上露子的反战诗人凤毛麟角，类似宫本百合子、长谷川照的反战活动家也人数寥寥，但她们英勇无畏的反战斗争乃至献出宝贵生命之壮举，对阻止日本民族走向毁灭和人类共同战胜日本法西斯做出了重要贡献。这方面，拟另文阐述。

二、部分日本妇女盲从侵略战争的原因

那么，究竟什么原因导致部分日本妇女盲从和协助了统治阶级发动的侵略战争？笔者认为，主要是由以下三个方面的因素共同作用所致。

1. 神国观念和天皇崇拜思想的心理驱动

神国观念和天皇崇拜思想，最早渊源于日本的古代神话传说。日本古籍《古事记》和《日本书纪》，就描绘了一幅日本国土（“大八洲”）和日本民族神话式起源的生动图景。这一根植于日本民族心理土壤中的思想观念，后经历代统治阶级的人为强化而根深蒂固。诸如，大化改新前圣德太子创造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天皇”一词、确定必须由与天照大神有血统渊源的皇室成员来问鼎皇位的大统承继原则等，就是古代日本王室强化这一思想观念和确保天皇统治“万世一系”的重要举措之一。时至近代尤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一观念意识随着军国主义教育的全面展开而空前强化。全面侵华战争前夕即1937年5月，文部省编撰出版了所谓“战前日本的一本‘圣书’”——《国体之本义》，宣称：“大日本帝国拥戴万世一系

之天皇，信奉皇祖的神动”；“我肇国乃始于皇祖天照大神把神敕授予皇孙琼琼杵、降临丰苇原之瑞穗国之时”；“天皇天生具备诱人之恩德，皇位越臻巩固亦越神圣”；“我国是一个大家族国家，皇室是臣民的本家”^⑪。太平洋战争前夕即1941年3月，文部省又推出了可谓《国体之本义》姊妹篇的《臣民之道》一书，声称：“没有像我国这样肩负着崇高世界使命的国家”；“具有如此国体的国家，在世界任何地方也找不到”；“国民自觉奋起，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优秀的神国”；“我等生活都要归一于天皇”^⑫。1944年2月，被称为明治、大正、昭和三代论客的德富苏峰，推出了《必胜国民读本》一书，初版就印刷了50多万册。其中云：“因为日本是天皇统治的国土，称之为皇国是理所当然的。人民自先祖以来就一直是天皇的臣民，称之为皇民也是理所当然的。同时，天皇又是现人神，现人神统治的国家应该称为神国。居住于神国之中的我等，称为神民也绝非傲慢。……了解日本国的第一要义就是要知道日本是神国。”^⑬正是在这般反复灌输和教化下，天皇是“神”、日本是“神国”、外国人“能够置身于天皇陛下的统治之下是何等幸福”、对华战争是“让中国人获得幸福的圣战”^⑭等在具有普通常识的人看来简直就是胡说的蠢话，多数日本国民却深信不疑。因为他（她）们从中小学时代起，就接受了这一神国观念和天皇崇拜思想的系统教育。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文中分析“日本军队的长处”时所提到的“其对天皇和对鬼神的迷信”^⑮，主要就是针对天皇的崇拜和对神国的迷信。

值得注意的是，神国观念和天皇崇拜思想是一种类似于宗教感召的观念意识，它比一般的政治学说更具有煽动性和迷惑力，它对日本民族性格的形成及其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日本政府长期强化这一思想观念的结果，必然滋生“大和民族优秀论”与“其他民族劣等论”这一种族差别意识，必然产生“自我认识”与“他者认识”的严重偏差，必然派生出岛国集团劣根性和愚忠盲从心理，必然左右日本国民的心理归向和造成大和民族群体向某一特定目标突进的心性。换言之，只要是天皇的意愿或冠以天皇的名义，日本人就会视为“神”的召唤，举国一致予以响应。这是导致包括妇女在内的部分日本国民盲从和协助所谓“圣战”的重要原因之一。日本学者若槻泰雄曾就此深刻指出：在神国观念和天皇崇拜思想的影响下，“日本国民都处于一种集体精神

错乱的状态，投入到了缺乏自知之明的侵略战争中，……我对日本国民的非理性和非良心性不能不深感耻辱。……那场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是天皇制。我坚信：只有废除天皇制，中国人民才算是彻底追究了那场战争的真正的加害者，另一方面，日本国民也才能够从天皇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只有到那个时候，真正的中日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和友好才能实现。”^⑨

2. 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教育的灌输毒化

为提高国民整体素质以实现资本主义近代化，明治政府非常重视基础教育包括女子教育，因此学龄女童的入学率不断提高。据统计，女童入学率1878年为23.5%，1888年为30.2%，1898年为53.7%，1908年为96.9%，1912年为97.6%^⑩。时至明治末期，女子中学和女子大学亦纷纷建立。1893年高等女校只有28所，学生数仅为3020人；1912年高等女校增至209所，学生数增加到64871人。随着大中小学校女生毕业人数的增多，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教育越来越深刻地影响着日本妇女的思想和行动。

1872年，明治政府颁布了具有改革意义的教育法令——《学制令》，表明日本近代教育最初具有明显的进步性。然而，面对自由民权运动的蓬勃兴起，政府决定改变《学制令》确定的自由主义教育方针。1879年公布的《教学大旨》，制定了“以忠孝仁义为中心，以修身教育为主轴”的新教育方针。1881年颁布的《小学校教则纲要》，不仅将修身课列于各科之首，而且规定历史课“必须以振奋尊王爱国的志气为着眼点”^⑪。同年颁布的《小学教员须知》，则强调“导人善良比教人多识更重要”，要求教师教育学生“忠皇室，爱国家”^⑫。如果说上述教育法规仅仅偏离了《学制令》规定的正确教育目标，那么1890年10月30日以明治天皇名义颁布的《教育敕语》，则彻底扭转了日本近代教育的发展方向。《教育敕语》不仅把“天皇之德化，臣民之忠诚”确定为“国体之精华”和“教育之渊源”，而且将教育目标统合到“一旦危急，则义勇奉公，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这一军事目的上来。为此，要求女子学校在内的所有学校，都要在校园内建立安放《教育敕语》誊写本和悬挂天皇照片的“奉安殿”，教师和学生每天到校、离校时都要向“奉安殿”行鞠躬礼；遇有庆典，要求学生朗读《教育敕语》，高呼“天皇陛下万岁”，升“日之丸”旗，唱“君之代”歌，等等。自此，从小学、中学到大学，日本教

育便沿着培养天皇“忠良臣民”的歧途前进^⑬。

时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教育敕语》的基本精神被一以贯之继承下来，具体体现在前述文部省编发的《国体之本义》、《臣民之道》以及《战时家庭教育指导要项》等“家族国家的经典”中。诸如，天皇统治日本“是我国万古不变的国体”，“教育在根本上与祭祀和政治相一致”（《国体之本义》）；舍己忘我为天皇效劳，“是日本国民惟一的生存之路，是一切力量的源泉”，包括“游戏”、“睡觉”、“吃饭”、“穿衣”等私生活，“也一刻不能忘记为天皇的国家服务”（《臣民之道》）^⑭；“家是以皇室为宗家，……基于忠孝一致之大道培养子女之场所”（《战时家庭教育指导要项》）^⑮。如果说这些小册子是战时法西斯政府间接统制国民的思想武器，那么《家庭战阵训》、《母亲战阵训》等一系列训令的出笼，则是直接将广大日本妇女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为侵略战争服务上来的有力工具。

战时日本军国主义女子教育，主要围绕“勤劳”和“母性”两个方面展开。前者针对的是在校女学生和未婚女子，主要通过“勤劳奉献”和参加“产业报国运动”来进行；后者针对的则是已婚妇女，主要围绕稳定家庭、生育和教育孩子来展开。1930年12月，文部大臣发布《关于家庭教育振兴令》、文部省次官发布《关于妇女团体之设置及活动通报》，号召“振兴家庭教育”，“促成妇女团体之奋斗”，“唤起一般妇女之自觉”^⑯。1941年4月，将“小学校”改称“国民学校”，下设“母亲班”，双管齐下对母亲和子女进行军国主义教育。1943年9月，政府发布《促进女子勤劳动员令》，提倡以女学生和未婚女子为主结成“女子勤劳挺身队”，积极投身“勤劳奉献运动”和“产业报国运动”。1944年8月，先后发布《学徒勤劳令》、《女子挺身勤劳令》，动员女学生进入军工厂劳动奉献，学校逐渐工厂化^⑰。结果，所有日本家庭成了天皇“忠良臣民”的训练所，所有日本妇女成了“灭私奉公”、“尽忠报国”的模范。她们多数从自己的“小家庭”走向国家这个“大家庭”，对战争政府的指令无条件服从，对战争的“正义性”深信不疑，坚信自己的“支前”努力以及将男性亲人送上前线天经地义，对至亲之死无怨无悔。军国主义教育对包括妇女在内的日本国民的毒害之深，由此可见一斑。看来，毛泽东当年在《论持久战》一文中将“日本军阀多年的武断教育”^⑱（即军国主义教育）视为造成我

军抗战异常艰难的原因之一，是有的放矢的。

3. 媒体的错误诱导和政府的高压统制

日本发动的“总力战”要求各行各业为侵略扩张服务，言论出版界也不例外。法西斯政府通过颁布《言论出版集会临时取缔法》、《出版法》、《报纸法》等一系列战时法律，将报纸、杂志、广播等媒体全部纳入战争轨道，封杀一切进步思想以集中灌输军国主义，诱导和驱使更多的日本国民为侵略战争卖命。这就使主要通过这些媒体获取信息的日本妇女，因每天接触美化侵略战争和掩盖战争暴行的虚假报道而失去了对战争是非的判断力，很难了解战争真相和被侵略国家人民的战争剧痛。例如，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京新闻》等报纸连篇累牍报道小学生为捐造飞机而节约每一枚铜板、女学生用血书勉励军人作战等所谓“感人美谈”；一二八事变爆发后，《大阪朝日新闻》等报纸盛赞所谓“肉弹三勇士”及其身后三位“军国之母”的“英雄事迹”；珍珠港事件爆发后，《茨城新闻》等报纸讴歌藤田多美子为激励飞行员出征而投井自杀的“尽忠之举”……随着战局扩大，报纸、杂志和广播对“军国之母”、“军国之妻”的介绍迅速增多，极尽煽动国民战争狂热之能是。其中，专门以妇女为对象的女性杂志发挥了特殊作用。

战时影响较大的妇女杂志，主要有《主妇之友》、《妇人俱乐部》、《新女苑》、《妇人画报》、《妇人公论》、《女性往来》、《女学生》、《日本妇人》、《女性展望》等。《主妇之友》从九一八事变起刊登助战文章，到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火药味渐浓，类似《南太平洋之战与妇女之觉悟》、《遭受了空袭怎么办》以及歌颂山本五十六大将的文章，大量出现在该杂志上^⑤。1943年9月，该杂志刊发了岸信介关于决战时期服装生活之讲话，号召妇女“把纤维变成战斗力”。他宣称：“如果每人浪费人造棉一反（按：日本布料丈量单位，“一反”相当于一件和服的衣料），就损失掉500架飞机、5390辆战车。……做新衣服就等于从前线拿走等价的武器，从前线士兵那里拿走飞机、子弹来打扮自己。”因此，希望妇女“发扬传统的坚韧精神”，“想办法不做新衣服，临时凑合一下”^⑥。1944年7月，该杂志又刊载了纲谷才一的《我看服装》一文，对夏季里“故意戴手套”、“披花边披肩”、“眼涂蓝色的眼睑膏”、“长指甲染成红色”、“头发烫成斗鸡和狮子一样的卷发”、“穿着要露出屁股的短裙”的女性，不但自己“看不顺

眼”，而且认为“人人见了都该痛打她一顿”，因为她们“一点也不考虑时局”^⑦。1943年9月，《妇人画报》刊发了西原敏男撰写的《缩短和服的袖子与闲置衣物的再利用》一文，同样劝导女性节约助战。他宣称：“同胞们！……面对未曾有过的事关国家和民族存亡的大战，在把丈夫、父亲、儿子、兄弟送往枪林弹雨战场上的时候，后方女性穿着花里胡哨的笨重和服是不合时宜的。身着妇女标准服的轻盈步履，……应是大东亚十亿母亲的形象。”^⑧1944年4月，该杂志又刊载了中村光甫的《衣服的战场化》一文，要求妇女必须牢记：“服装是未完成的火药”，“浪费服装就是浪费武器”，要使“服装生活战场化”^⑨。在如此高密度和高强度的劝导下，妇女会因为感到“愧疚”和“过意不去”而协助战争，或被强大的舆论氛围裹挟而盲从战争。

在进行舆论诱导的同时，法西斯政府还对包括妇女在内的日本国民进行了高压统制。如前所述，“总力战”要求动员国家一切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为战争服务。由《国家总动员法》、《治安维持法》、《治安警察法》、《思想犯保护观察法》等战时法律构筑的高压统制，“不仅殃及宣传领域，也殃及个人”^⑩；不仅对男性“思想犯”进行了毛骨悚然的折磨，也使少数反战“妇女遭受了残酷的凌辱”^⑪；不仅无产阶级妇女运动被窒息，也使资产阶级妇女运动遭受沉重打击。这是造成多数日本妇女屈从战时体制，未能掀起亚洲人民所期待的妇女反战运动的重要原因。

自1937年9月法西斯政府成立“国民精神总动员中央联盟”、提出“举国一致、尽忠报国、坚忍持久”三大口号起，就不再允许反对和批判国家的战争政策。万一有人做了类似的事或说了类似的话，就要被邻居作为“要注意的人”而受到全村人的排挤和制裁，甚至有被当作“非国民”向警察告密的危险。“去告密的人完全不是想要做坏事，而是以出色地完成了‘国民义务’的‘爱国者’自居。当时有许多这样的‘爱国者’。”^⑫就是说，战时只要言谈举止与大多数人尤其军部不一致，就有招致逮捕乃至暗杀的危险。姑且不论警察、宪兵对左翼活动家的迫害，就是暗杀稳健派政治家的恐怖事件也屡见不鲜，甚至连宗教徒和小学生也不放过。例如，1939年，基督教“灯塔社”领导人明石顺三因所谓“失敬罪”和“抗命罪”而获刑；1940年，基督教领袖贺川丰彦被宪兵逮捕而锒铛入狱；1941年，朝鲜2000多名

基督徒被投入监狱（其中有 50 余人惨死）。除基督徒外，还有 3000 多名“大本教”教徒被捕入狱，其神殿等设施被政府当局炸毁^⑤；德岛县中岛小学一名四年级的女学生，因给远在“满洲国新京”的母亲写信说“天皇等人可以死去”^⑥而获刑 1 年。可见，包括妇女在内的部分日本国民所以走向战争政府一边，除了与该民族的从众心理等因素相关联，还与战争当局高压统制的驱动和由此形成的恐怖氛围的裹挟密不可分。恰如日本学者西川祐子所说：“历史告诉我们，……在女性走向支持战争道路的时候，战争不仅仅是意味着破坏与流血的悲惨事件，也是自由的个人意志被巨大的国家意志彻底毁灭的过程。”^⑦这样，我们就明白了“贤妻良母怎么会成了维持侵略体制的帮凶”^⑧。

综上所述，战时日本妇女一方面饱尝了饥饿、贫困和亡夫丧子之痛，因此是本国统治阶级发动的侵略战争的受害者；另一方面，她们送男性至亲参军参战和在后方从事实实在在的“支前”工作，又使自己扮演了对被侵略国家人民的加害者角色。换言之，与本国其他男性国民一样，战时部分日本妇女是带着“受害者”和“加害者”的双重身份走进侵略战争的，这是帝国主义侵略国家民众的一般实态，只是在日本妇女这里表现尤为突出而已。恰如日本学者津田道夫所说：“那场战争是每个国民都被作为战争的执行主体动员起来的，……日本大众的战争责任也应该被追究。”^⑨我国学者李兆忠亦尖锐指出：“的确，日本军国主义能够如此为害人类，离不开占一半人数的日本女子的支持。”^⑩然而笔者认为，我们探讨日本妇女与侵略战争尤其侵华战争的关系问题，并不是为了追究兼是战争“受害者”的日本妇女的战争责任，而旨在希望日本妇女在汲取过去盲从侵略战争沉痛历史教训的基础上，不再盲从今天重新抬头、蠢蠢欲动的日本右翼势力，尤其企盼包括妇女在内的日本国民在防范日本军国主义复活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在日本与周边国家再起冲突时敢于说“不”。我们高兴地看到，战后痛定思痛、深刻反省当年盲从行为的类似秋山洋子、渡边澄子的觉悟女性日渐增多。她们或扪心叩问“女性是不是在作为体制的受害者的同时也是体制的共谋？”^⑪或经常前来中国调查日军性暴力犯罪事实。在日本社会右倾化尤其右翼势力蠢蠢欲动的新形势下，笔者期待有更多学者重视日本民众与侵华战争的关系问题，以推动包括妇女在内的

日本国民更多更快地走向觉醒。

注释

①胡澎：《战时体制下的日本妇女团体》，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 59 页。

②梁启超：《祈战死》，《饮冰室专集》第 2 册，第 37 页。

③L·比尼恩：《亚洲艺术中人的精神》，孙乃修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 年，第 94 页。

④《東史郎日記》，熊本：熊本出版文化会館，2001 年，第 21 頁。

⑤大島孝一：《戦争のなかの青年》，東京：岩波書店，1985 年，第 118 頁。

⑥⑦⑧⑩⑪⑫加納実紀代：《白の軍団＜国防婦人会＞——女たちの草の根ファシズム》，岡野幸江等編：《女たちの戦争責任》，東京：東京堂，2005 年，第 6 頁，第 8 頁，第 8 頁，第 6 頁，第 9 頁，第 5 頁。

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蒋立峰、汤重南主编：《日本军国主义论》（上），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 601 页，第 586 页，第 569-572 页，第 600 页，第 519 页，第 572 页，第 607 页，第 617-619 页。

㉞加藤周一：《何谓日本人》，彭曦、邬晓研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 年，第 156 页。

㉟⑰藤井忠俊：《国防婦人会》，東京：岩波書店，1985 年，第 63 頁，第 209 頁。

㊱千野阳一編：《愛国・国防婦人運動資料集》，東京：日本図書センター，1996 年，第 30 頁。

㊲池雨花編著：《雪国之櫻—图说日本女性》，北京：团结出版社，2006 年，第 151 頁。

㊳色川大吉：《昭和五十年史话》，天津政协翻译组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 年，第 128-129 頁。

㊴㊵㊶家永三郎：《戦争責任》，東京：岩波書店，1985 年，第 297 頁，第 297 頁。

㊷井上寿一：《日中戦争下の日本》，東京：講談社，2007 年，第 32 頁。

㊸㊹㊺㊻㊼㊽㊾㊿渡邊澄子：《日本の近代戦争と作家たち—女性文学者の戦争加担》，岡野幸江等編：《女たちの戦争責任》，東京：東京堂，2005 年，第 127-128 頁，第 134-135 頁，第 133-134 頁，第 126 頁，第 122-127 頁。

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井上理恵：《メディアのなかの女たち—無自覚のプロパガンダの恐ろしさ》，岡野幸江等編：《女たちの戦争責任》，東京：東京堂，2005 年，第 116-117 頁。

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小林裕子：《美談としての銃後の妻—家庭小説のなかの良妻賢母像》，岡野幸江等編：《女たちの戦争責任》，東京：東京堂，2005 年，第 237-247 頁。

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张晓宁：《与谢野晶子及其反战诗》，《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 年第 2 期。

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若槻泰雄：《日本的战争责任》，赵自瑞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年，第 287-289 页，第 290-291 页，第 340-341 页，第 339-340 页，第 1-2 页，第 243 页，第 262 页，第 294 页，第 245 页，第 253-254 页。

③④⑤毛泽东:《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03页,第503页。

④①④②④王桂:《日本教育史》,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140页-201页,第152页,第148页,第170页。

④④文部省教学局编:《臣民之道》,东京:内阁印刷局,1941年,第71页。

④⑤近代日本教育制度史料编纂会:《近代日本教育制度史料》,第7卷,东京:大日本雄弁会讲谈社,1956年,第513页。

④⑤①②③若桑绿:《总体战体制下的私人生活统制—妇女杂志的“战时服装”报道及其意义》,见秋山洋子、加纳实纪代编:《战争与性别—日本视角》,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66页,第70页,第67页,第71-72页。

⑤⑨西川祐子:《总体战与女性:向战争的倾斜与翼赞

“妇女”们》,见秋山洋子、加纳实纪代编:《战争与性别—日本视角》,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43页。

⑤⑩加纳实纪代:《满洲与日本女性》,见秋山洋子、加纳实纪代编:《战争与性别—日本视角》,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142页。

⑤⑪津田道夫:《南京大屠杀和日本人的精神构造》,程兆奇、刘燕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年,序言第3页。

⑤⑫李兆忠:《看不透的日本—中国文化精英眼中的日本》,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258页。

⑤⑬秋山洋子、加纳实纪代编:《战争与性别—日本视角》,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前言第2页。

责任编辑 梅莉

Japanese Women and the War of Aggression against China

Sun Lixiang Han Lijuan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Abstract : During the war, a number of Japanese women not only suffered from hunger , poverty and bereavement, but also blindly followed the war of aggression waged by the Japanese ruling class through their practical work——“Supporting Battlefront”. The Japanese women entered the aggressive war with the double identity of “victims” and “perpetrators”, which is the general actual state of the common people in imperialist aggressive countries, but particularly prominent only for Japanese women. During the wartime, the blind obedience of Japanese women to the aggressive war mainly showed in three aspects: firstly, encouraging sons or husbands to join in the wars to provide sufficient manpower for the aggressive war; secondly, actively participating in the rear “Supporting Battlefront” work to provide material guarantee for the aggressive war; thirdly, creating literary works and national policy movies to generate public opinion atmosphere benefiting for the war. As to the reasons, it is the comprehensive result of many elements, such as, the psychological drive of the concept of divine country and the worship of Mikado among Japanese, the poisoning and indoctrinating of the nationalism and the militarism education, the misleading of the media then, and the iron rule of the government. In current situation that the Japanese right-wing forces are ready to start wriggling, pointing out the truth that this part of Japanese women blindly followed the aggressive war in the wartime and analyzing the dynamic factors behind their acts, have important academic value and realistic significance in order not to repeat such historical tragedy.

Key words : Japanese women; the war of aggression against China; the Second World War; Sino-Japanese relations